

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困境及批判

陈伟华

【摘要】 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进路是强调进行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以生态女性主义的关爱伦理,推进人“类”主体的实现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成。但是,在实践中,生态女性主义面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础的现实挑战;需立足于劳动解放或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才能推进女性地位的提高与人—自然关系的改善,实现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实践困境;实践批判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5)09-0162-6

生态女性主义从关注生态运动入手,将自然与女性议题相结合,并成为其理论生命力的重要基础。对于一种理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一个观念的得与失,而是它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影响的”^{〔1〕}。面对不同语境下的生态女性主义,需要对其理论进行辩证扬弃,面向实践展开生态女性主义的剖析与批判,以对现实问题产生积极的意义。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范式:生态环境保护的“她性”实践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后殖民时代的到来,南北两极分化加强,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日益凸显。在当今语境下怎样改善环境?生态女性主义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是通过将女性与自然进行类比,掀起一场反对“二元统治”逻辑框架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

在伦理实践上,生态女性主义推崇女性主

义的关爱伦理和语境主义伦理(contextualist ethic),以形成人—人和人—自然间的和谐关系:一方面倡导涉及男性与女性、白人与有色人种、成人与孩子、富人与穷人等联系的人际关爱,推进人“类”主体的实现;另一方面强调人对自然的关爱,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成。

在实践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实践是一场“批判父权制下的所有不平等现象的平民政治运动”;是一场解除所有处于二元统治逻辑框架中处于下层的“草根”而展开的生态政治运动。它倡导批判所有处于二元统治逻辑架构下的不平等现象,从性别关系的关注拓展至人与自然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并对种族歧视、贫富歧视等所有不平等现象均予以声讨,倡导推翻这些不同领域共存的二元统治逻辑,实现不同地域、种族、年龄、性别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实践路径上,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权运动和

〔基金项目〕 2011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课题“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批准号:11ZXC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伟华,南京工业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211800。

环保运动进行联盟,由此实现生态女性主义的蓝图——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在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中寻求男女平等目标的实现与生态文明的未来。

在实践特质上,生态女性主义是一场开放性的实践运动,具有实践上的多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追求人化自然的和谐”,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追寻与地方情境的融合,强调实践的地域特色。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形成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科技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跨国公司利用资金、技术上的优势,掠夺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其附属的“加工厂”和“装配厂”;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增长,人类向自然索取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向自然排放三废的规模和程度日益增加,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日益凸显。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南北差距拉大,面对不同国家的巨大发展差距,各国如何携手共进?

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持有先进技术与资金雄厚的发达国家,应以更多的同情与关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上提供支持帮助,使不同情境下的人们形成联盟,共同关爱我们的地球。生态女性主义实现这种关爱的途径是:要求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打破二元统治逻辑概念框架,通过和谐理念的构建,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形成生命共同体;具体的伦理方式则是通过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以特定情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人对自然的关爱,实现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统一。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范式”呈现为一种从伦理精神向现实人与自然关系状况改善的进路。

二、遭遇实践之困境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强调“责任伦理”,在这样一场国际争论中似乎有着凸出的现实意义。但是这种责任意识在各自为政的当今世界格局下并未

奏效,不仅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发展权,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格局中也仍想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继续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中获取超额利润。生态女性主义所批判的“二元统治”逻辑框架如何才能被推翻?在这场爱护“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责任与义务分担会议中,如何体现环境公平与正义?走向实践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否真能如其所愿:以关爱伦理掀起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消除人们思想中的“二元统治”的逻辑框架,在互帮互助中实现一种集体的行动,全世界各国联手拯救地球?依靠各国的关爱与责任意识有助于形成团结的集体,共同面对“一个地球”?

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面对当下的环境危机全球人类应该分担的平等义务、“环境正义”准则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从伦理向度上看来,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疑义。事实上,工业化国家将碳排放“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碳排放的增加最终将影响到全球。

同时,在责任与关爱的口号下,对中国、印度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与发达国家等同的减排标准,则是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虚伪的“平等”、“正义”的旗帜下,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永远生活在远低于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下,让发达国家继续保持经济、技术的领先,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唱主角,成功扼制住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脚步。

据世界观察研究机构的年度报告《世界状况》的报道,“经济学家和政策科学家的新的环境保护主义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和经济学家们的措施已经为热心的商业组织和政府所拥有。但是实践上,处理环境危机的主流建议已经失败了”^[2]。将环境资源纳入市场的经济手段和政策并没有对环境保护产生重要的效果;相反,只是更增强了人们的金钱崇拜观。环境成本的纳入,最终随着消费者商品的购买和使用一道成为顾客们的支出。建立在金钱支出的基础上人们的环保政策,只是最终将环境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商家并没有试图去真正为环

境保护做出有效的工作。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这种做法具有诸多的掩盖的“环境非正义”的虚伪性。

首先,减排标准制定的抽象主义,没有体现减排标准的地方性。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所辩护的是一种整体主义哲学观,要求人们的道德行为需要考察生长它的语境,强调结合各国“语境”的生态运动与人权进程。但是,“在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否认发达国家应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反而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定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3],这是割断历史的片面思维。中国也有发展的权利,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对中国提出的这类不合理减排标准,就意味着中国停止发展。欧美发达国家以强制减排标准来扼住中国发展的“咽喉”,企图以此为棋来维护其世界格局的优势地位。

其次,“人道主义”的关爱的虚伪性。生态女性主义强调以“女性的方式”呈现“关爱伦理”。尽管表面上,“由英国、美国和丹麦起草的提案将部分发展中国家列入‘最脆弱国家’,单独设立减排目标”,似乎对发展中国家也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通过这一步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拉拢和赢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使中国被孤立。在这场角逐中,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牺牲来换取其他多数国家的环境福利是合理的吗?事实上,这种做法的企图是“以此分裂发展中国家阵营”,尤其是把枪口对准中国。这种做法的目的仍是为维护世界格局的等级体系。

再次,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分离。生态女性主义的整体主义哲学认为,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问题涉及的关键是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在西方传统伦理学中,父权制“英雄的伦理学”框架下的价值等级构架假定了不同物种等级次序的原则、规则和权利系统,这种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规则或权利在等级的顶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二元文化

极端体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与发展中国是否应该一样?发展中国家靠现有的资金、技术力量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只能停止发展;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技术资金、技术;保证资金真正用于碳减排。

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国的牺牲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少数人的利益”。中国的人口众多,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十多亿中国人过上美国澳洲一样的富裕生活,这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这种论调是将中国人置于劣等地位。中国的牺牲在世界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美国正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于正处在发展中的中国提出苛刻的要求,且公开表示不会对中国予以支持,这是对其表面“仁慈”的一种讽刺。这种“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殖民主义”做法,“实质是在为发达国家‘继续半公开地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寻找借口”^[4],这种更符合哈丁“救生艇理论”的主张,是一种新形式的强权政治,在面对地球的有限资源时,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彰显无疑。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环境问题的全球化症结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分析架构,有助于理解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文化诱因;在解读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物史观,则使这种批判显得更为深刻有力。欧美发达国家的割断历史的形而上学思维、忽视人口众多的中国的现实的二元统治思维,面对“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5]的趋势,欧美发达国家想继续维持国际格局中的主宰地位,使国际安全格局将由两极对抗型的美苏争霸时代转变为欧美中心时代,多极竞争的多元状态使欧美感觉到自己的主宰地位的衰退。在这“二元统治”思维背后的仍是各国的利益之争。

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范式尽管对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有着看似完美的解答,但是在不同国度的竞争中,要求各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剔除二元统治逻辑概念框架,对他国施以同情与关爱,仍缺

乏根基,思想文化的转变是与现实的物质基础紧密相关的。

三、实践困境之因

生态女性主义提倡以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来清除二元统治逻辑框架,以“关爱”伦理来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对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有着看似完美的解答;但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各国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水平、世界多极化的政治格局、生态女性主义面临一系列实践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状况:不平衡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活动,以及跨国公司生产、销售的全球化,“全球化侵略性扩张而导致的地球人们和地际自身的贫穷危机的日益加深”^[6],国际垄断的加剧,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仍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和机遇并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7],对地球资源的采掘与消耗也成为世界性的。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如何才能避免全球化过程中的新殖民主义?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世界经济日趋集团化、区域化,规模加速扩展、模式加速创新,形成各种国际性的合作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国家共同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展现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强劲趋势;但是,在这种区域合作的表象下,也面临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带来的种种摩擦与纷争。譬如,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法国、荷兰等国家担心他们的福利待遇受到影响。

各国不平衡的经济水平,生产力的不同状况,引发的在责任、义务承担上的争议;在面对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冲突中,各国仍以“经济人”身份来展开综合国力的竞争等因素导致生态女性主义追寻平等和谐的目标失去了现实基础:世界各国在“环境正义”的掩饰下以“权利伦理”来实现

其发展目的;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共同“责任”下的“关爱”,成为某些发达国家维护既得利益的幌子。

(二)政治格局:多极化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权力政治博弈影响大国关系走向的确定性……政治极化导致对抗因素显著上升……西方国家陷入多重危机,面临体制和结构变革的震荡,并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地区……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的诉求出现无序化状态,正在酿成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埃并严重外溢”^[8]。尽管生态女性主义也试图对政治意识形态、政府决策层产生影响,但是没有物质基础的文化或观念变革,终究只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9],在这些国际政治问题中,经济动因是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

在世界格局从两极向一超多强、呈多极化趋势发展的转变过程中,仍存在着国家之间的势力争夺,而美国仍想重振世界领导地位,其他国家也想在世界舞台上争取自身更多的话语权;在当今的世界格局转型动荡中,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意识形态,“权力”的争夺等环境下,生态女性主义试图打破二元对立的统治逻辑概念框架看起来仍缺乏共同的政治基础。

(三)文化状况:多元化

在渊源流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河流文化造就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发源地,出现了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古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古中国的黄河流域这四大“大河文明”。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不同特色:西方文化、东方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世界丰富多样的有机组成;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不同的历史和人文背景形成了不同的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神道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罗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不同

的文化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伦理诉求。一方面,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现实需求、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出现了全球化过程中的认同危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共识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但在接触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情绪化的抵触,从而造成文化适应上的心理阻滞”^[10],缺乏国际公共认知能力或认知滞后,难以形成有效的“类”主体;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强势文化的扩张,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向他国输出本国文化及价值观,对弱势国家民族文化产生强烈冲击,甚至对部分传统文化歪曲和误读。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沉淀过程中创造和发展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中,要保持各民族文化生存的张力空间,需要各民族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以适应各国国情和促进各国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面对不同地域、民族的不同历史与现实境况,突出地方性特色,突显其伦理文化的情境。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不同民族文化视域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情境伦理如何沟通与对话?在不同的现状基础以及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道路上,如何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各国要求同样的关爱与责任,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显示出的狭隘的国家主义价值取向,更显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乌托邦色彩。

(四) 社会基础:薄弱化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与人—自然之间存在类似的统治逻辑框架,传统社会建构的性别文化与体制下,为女性提供了更多与自然亲近的机会。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在选举权、教育权、就业权等领域中,女性已经获得了一定权力,甚至有相当部分女性成为某些企业、部门的精英。摆脱社会化性别歧视地位的女性,逐步走出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角色。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疏离,女性还会为自然环境的

破坏而感同身受地努力争取对自然的尊重与关爱吗?在这种状况下,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似乎已经釜底抽薪,面临运动主体的缺失。

四、跨越实践困境之思

生态女性主义术语诞生至今已40年,在环境哲学、政治哲学等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领域已产生巨大影响,“妇女作为大地的儿女捍卫大自然,以消费者身分捍卫消费权,以生育者捍卫下一代健康成长的环境,以劳动者力量争取安全合理的工作环境和条件都是因应生存环境的因素而作出反应”^[11]。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性与自然相进行类比,批判父权文化下的二元统治逻辑框架。生态女性主义不追求普遍性,具有理论的开放性、包容性,这为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不平衡性和文化多元性态势中为理论的存在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诸多环境保理论及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环境伦理学是一个面向实践的哲学,不仅要求观念上的前瞻性,在实践上也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性。生态女性主义的环境哲学尽管在观念上为人类提供了环保的新境界,但是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中,践行它却是令人困惑的。

思想文化的转变与现实的物质基础紧密相关。生态女性主义关注制度、文化在变革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作用,但割断了人类的生产历史,对人类社会的关注忽视了生产劳动水平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演绎成为一种缺乏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显示出其观念的唯心主义倾向。“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思想体系始终具有经济属性,那些最后演变为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言论构成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12];在“经济人”概念框架下,当代资本主义为了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将世界资源纳入关注视野,张扬人的自私性,使西方传统的二元主义文化极端化为利己主义,走向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重视物质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发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打破二元统治逻辑框架、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生态恢复、女权复归是一个自然的历

史的过程,融合于劳动解放或生产发展的历史之中”^[13];只有不断推进科技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达,实现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面对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视野中,联系历史、关注各国的国情,尤其是各国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以及现实水平,是追求环境正义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原则。环境正义的实现是一个涉及时空语境的范畴,不仅仅要看当下,还应结合历史;不仅要看人们的理想追求、文化观念,更重要的应结合物质状况和生产力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合理,实现环境正义。生态女性主义运动需要的不仅仅是对父权制的统治逻辑的揭示和批判,还应结合地方的生产力水平,在推动经济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建构与发展其理论体系并形成策略。尽

管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关注不同语境下的人们的参与,但是它忽视生产劳动这一根本决定性力量的视角,使其面向实践时呈现出非现实主义倾向。

在经济转型与全球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全球化“不是一个世界统一化、同质化的进程”^[14],要求各国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实现思想观念的突破,需要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事实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打破二元分立的观念,在差异中求共进与发展,相互支持和合作。如果能怀着这样共同的目标,我们将看见人与人之间的日益增强的真诚合作,女性主义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璧合将真正促进环境问题的改善,朝向人、自然、社会的和谐迈进!

【参考文献】

- [1] 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青岛出版社,1999.2.
- [2]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M]. Routledge, 1995. 78.
- [3] 李艳艳.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型话语工具[J].红旗文稿,2014,(13).
- [4] 李风华.我们能否共同求生——对哈丁救生艇理论的逻辑批判[J].哲学动态,2011,(3).
- [5] 吴怀友,王珍.试论胡锦涛关于时代发展的思想[J].社会主义研究,2011,(3).
- [6]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Integrating Ecofemin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Religion[M]. Lanham · Boulder · New York · Toronto ·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5.1.
- [7]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254,115.
- [8] 江凌飞.世界陷入大乱局的11个征兆[J].当代世界,2012,(1).
- [10] 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3,(9).
- [11]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编著.地球·女人[C].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156.
- [12] 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0.
- [13] 孙道进.“生态女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维度[J].思想战线,2010,(5).
- [14] 张康之.全球化中的合作与和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2).

(责任编辑 王 林)